

●罗志勇

论谢拉的思想体系及其价值

ABSTRACT Shera had devoted all his life to the probe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library science. He founded a theoretical basis of library science—the social theory of cognition, to study the production, circulation, concordancy and consumption of the wide range of knowledge of the society. His theoretical ideology not only reflects changes of reality but indicates future developments; not only intensifies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library science but bridges theoretically the gap between library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Shera's theoretical basis, ideological system and methods applied to scientific research have been to this day of instructive significance to us. 30 refs.

SUBJECT TERMS Library science — Basic theories Librarians — U. S. Shera, J. H. (1903–1982)—Academic ideology

CLASS NUMBER G250.971.2

杰西·H·谢拉(Jesse Hauk Shera, 1903~1982)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图书馆学理论家、教育家,“文献工作和情报学领域的智者与先驱”^[1]。他思想宏富,著述颇丰,全部著述共有457种^[2]。这些著述内容涵盖了图书馆学的许多方面。尤其在探索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方面,他建立了自己的体系,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派别,从而确立了他在图书馆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近10余年来,我国图书馆学界对谢拉已作了比较多的介绍与研究。这方面的论文已经发表了10多篇,他的一些著作也被译成中文。谢拉的思想对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建设产生了较深的影响。人们研究谢拉,往往注目于其理论的高度思辩性,注目于其作为图

书馆学理论之基础的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但是,作为一个理论家,谢拉并没有把自己囿于纯粹的理论思辩中;他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在情报检索技术领域不懈探索,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图书馆学的整体概念,并把文献工作和情报学纳入图书馆学的体系中。作为这个体系统一的理论基础,社会认识论是谢拉的一个创造。

谢拉是一位成功的理论家,从其身上我们可以借鉴到不少的东西。适逢谢拉诞生90周年,笔者撰此文一以志纪念,二则希望能从他这里寻得一点启发,以指导于我们的专业研究与实践。

一、谢拉思想发展的四个阶段

(一)谢拉理论思辩特色的初步形成(1927~1940)。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图书馆学,这是谢拉理论思辩的重要特色,这个特色是与其接受的教育密不可分的。

1927年,谢拉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便开始了他的图书馆学研究生涯。1938~1940年,谢拉到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接触了当时图书馆学界一些著名的理论家,如威尔逊(L. R. Wilson)、道格拉斯·华尔普斯(Douglas Walps)、皮尔斯·巴特勒(Pierce Butler)等。在他们的影响下,学院自创立之始就自觉地应用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图书馆学,试图将图书馆学发展成一门学术性很强的社会科学,并试图将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从简单的技术培训发展成一种理论与技术并重的专才培养。这种教育环境塑造了谢拉终生的思辩特征,而这种特征最初集中反映在他的博士论文《公共图书馆基础》(Foundations of the Public Library)(1944)中。在这本书里,谢拉把图书馆史的研究置于对社会历史环境的考察之中,从而得出这样的结论:公共图书馆的目标只是反映社会本身的变迁而已^[3]。

(二)二战后谢拉的研究重点逐步转向书目组织与文献工作(1940~1952)。二战中,随着情报需求的急剧增长和许多社会部门参与,文献工作成为一种崭新的社会事业。此时,谢拉正服务于战略服务署(OSS),他利用制表机、穿孔卡片等现代化设备对自动化情报检索进行实验,取得成功并积累了经验。1947~1952年,谢拉成为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研究生院的专职教员。目睹形势的变化,联系自己的切身经验,他逐步把研究重点转向书目组织与文献工作,并在芝加哥大学初步形成了他的书目理论。

1950年,谢拉组织了一次“书目组织会议”。此时,谢拉已经把交流、书面记录(graphic record)等概念引入到了理论中,认为书目组织的任务是两种模式的匹配,即人

类利用书面记录的活动模式和把记录材料从生产者传向最终用户的中介服务机构的活动模式之间的匹配;书目组织是通过中介服务机构的间接交流^[4]。这就是谢拉召集这次会议的主导思想。

在对书目组织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谢拉确立了文献工作与书目组织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文献工作是学术界记录知识交流的现代系统的基本部分……是专家间原始材料间接交流的那部分书目组织。”^[5]1952年,谢拉和伊根(M. Egan)共同发表《书目理论之基础》(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bibliography)论文,试图从宏观交流的角度来认识社会书目事业,并寻求建立一种新学科——研究整个社会知识的生产、流通、整合和消耗的新学科——来作为书目理论的理论基础。这个新学科就是社会认识论,这是谢拉较早地研究社会认识论。

(三)谢拉在专业理论、教育和情报检索技术领域作进一步的探索(1953~1963)。1953年,谢拉应聘任西部后备大学(WRU)图书馆学院主任。1955年,谢拉在学院建立了文献工作和交流研究中心(CDCR),这正是其专业教育和理论研究思想的体现,而CDCR又成为谢拉事业成功的一个里程碑。

在谢拉的领导下,CDCR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协作精神是1956年“记录知识实际利用大会”(PURK Conference)的主旨,700多名代表来自工、商、学、政和图书馆界,充分证明了文献工作是一项社会性的事业。1957年,苏联第一颗卫星的发射震惊了美国科学界,谢拉立即把注意力投向全苏科技情报研究所,因为它的情报工作对卫星技术的进步发挥了尤其重大的作用。谢拉召集会议尖锐地指出:“必须建立全国科技情报协调中心,建立跨学科的情报服务。”^[6]这次会议促使参议院正式讨论科技情报协调问题并通过了《科技法案(1958)》(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t)。谢拉不是一个

内向的研究者,他是演说家,是社会活动家。他把他的研究与社会联系在一起,通过有组织的活动把影响扩大到整个社会,迅速实现其研究成果的社会价值。他召集的一系列会议都以其感召力形成跨国跨学科之势,谢拉的魅力和特色就在于此。

谢拉领导 CDCR 不懈地在书目控制新技术和情报检索新方法领域进行有益的探索,并通过开设新课程和组织学术会议使图书馆学院的教学内容丰富起来。他极大关注着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理论问题,1956 年便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最后形成了他最成功的代表作《图书馆学教育之基础》(The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1972)。在书中他提出:图书馆学教育的一般性原则便是要传授给学生一个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基础应该是社会认识论^[7]。

(四)谢拉思想的深化与系统化(1963~1982)。60 年代,谢拉不再热心于频繁的社会活动和对技术的实际探索,他开始了对其思想的系统总结。《图书馆与知识组织》(Librarie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1965)、《文献工作与知识组织》(Documentation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1966)是谢拉的两本论文集。其中的 33 篇文章大多发表在五六十年代,内容包括从图书馆学理论、书目理论、分类编目到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等文献工作的许多方面。作为谢拉的演讲稿而发表的《图书馆学之社会学基础》(The soc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ibrarianship)(1970)是他最具世界影响的一部著作。但是,这个讲稿与其说是其理论的最新突破,不如说是他 40 年专业实践和教学经历的系统总结,是用思想者自己的头脑对其思想的梳理与再生,因为这儿已少有新东西了。1970 年左右,谢拉又写了许多文章来反映情报学的最新变化。但是他仍摆不脱固有的思维定势,企图把情报学纳入他已有的思

想体系中去,作为图书馆学的一个分支而存在。1976 年,他出版了最后一部著作《图书馆学引论》(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他说他出版这本书“不是介绍图书馆学基本原理,而是想证实图书馆学工作作为一种事业,有其深刻而丰富的内容。”^[8]这里基本反映了他在图书馆学领域的世界观。谢拉以他的《图书馆学引论》结束了他终生的理论探索。

二、谢拉的思想理论体系

(一)理论的位置。谢拉认为,作为一门专业,图书馆学“应该有一个知识体、一个基础理论核心和一种主体实践活动。”^[9]理论基础是重要的。作为一种理论,它必须有解释能力,能解释当前存在的情况;有预见能力,能预示事物未来的发展。“图书馆员不能满足于为特定读者特定需求查找特定图书的‘职业花招’,理论和技术要协调发展。”“图书馆学理论必须提供这样一些问题的答案——人们怎样认识? 书面记录如何对社会产生影响?”^[10]

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谢拉认为理论只是对现实发展的一种总结。实践在不断进步之中,而理论作为一种观念有较长久的指导意义,但理论必须通过实践来追赶乃至领导时代发展的潮流。谢拉以他自身的经历实现了这个信条。他毕生追求的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在深刻的思辩之后找到了社会认识论;但他总是紧跟着时代的发展,研究重点从图书馆史到书目组织、文献工作,再到情报学,都是很实际的问题。但他又始终贯穿着对书面交流系统的理论阐释,自 50 年代初社会认识论的初步形成到 80 年代,30 年始终不变。

谢拉重视理论反映了一种历史的必然。上世纪末,杜威的图书馆学实用派有很大势力,“以最少的花费为最多数的读者提供最好的图书”这样一个信条长期代替了图书馆学

理论的全部。二战后,技术的进步和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使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知识交流和情报传递已成为这个时代的特征。发展理论并以理论反映这种变化已成为图书馆学研究的紧迫任务。谢拉以书面记录、知识交流等概念来构建理论,既反映了现实的变化,又预示了未来的发展;既增强了图书馆学的科学性,又在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之间搭起了一座理论上可以互相沟通的桥梁,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二)理论研究的方法。“要有探索精神……寻求能使本专业进行系统阐释、检验、证实和预示未来的基本概念与关系;要寻找理论基础;要有广义的可行性书目理论,在变革和技术革新方面允许勇敢的进取精神。”^[11]这就是贯穿于谢拉全部著作中的思想方法。

社会学的思辩方法是谢拉理论研究的一大特色。他不满足于对个人与图书馆关系的探讨,总是从社会的大框架中来认识图书馆事业。他发展了书目理论,认为书目理论提供了从研究个人到研究社会的思想转换机制,它要从社会知识的无序状态中寻找秩序^[12]。他提出了社会认识论,而社会认识论研究的是知识与社会的互动。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图书馆学,反映了时代的需要。谢拉的这个研究方法对我们今天仍有指导意义。

正如弗斯科特(D. J. Foskett)所说的,谢拉所做的只是对现实中出现的或进步了的工艺进行综合,“把各种解释形成系统,形成一个理论,从而在理论上阐释正在发生的和预示未来可能的发展。”^[13]谢拉的理论是从实践经验中来。他曾说:“我宁愿站在经验论(empiricism)的一边,也不愿从目的论(teleology)出发;实践证明,经验论更富于成果。”^[14]谢拉是把理论与实践结合得较好的一位理论家,CDCR的建立便是一个明证。现在我们有些人谈谢拉,言必称“理念派”,似乎谢拉的头脑中早已是充斥了哲学的、社会学的观念,他只是不经意地把图书馆学摆弄成

一种玄奥的理论。这种认识显然是片面的。

系统的观点和发展变化的原则也是谢拉理论研究中运用的方法论。他曾说:“自动化的进程迫使图书馆员进行系统分析,集中研究为用户提供书面记录的各种相关因素。”^[15]“图书馆事业是一个由众多互相依赖,互相关联的因素统一的协调组成的有机整体。”^[16]同时他又把图书馆事业视作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而其中技术手段的变化是最根本的因素。他认为图书馆员应该有应变能力,这样他将看到“在他的专业领域有着几乎无限丰富的知识。”^[17]

(三)理论基础。社会认识论是谢拉整个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他是从对社会结构的分析来探讨社会认识论的。他认为交流是社会的粘胶剂,以文字记录为媒介的书面间接交流是社会交流系统的主体,图书馆是社会书面交流机制(institution)的中介执行机构(agency)。图书馆的职能应该从整个社会来考虑,因而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只能是关于所有社会书面交流形式的形成、流通、整合和消耗的一种理论,是关于知识的知识。它研究知识对整个社会的作用,是整个社会的认识过程。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都无法完成这个任务,这只能是一门新学科;即社会认识论。

社会认识论成为谢拉思想体系的重要标志。在谢拉看来,社会认识论可以增强图书馆学理论的科学性、思辩性、解释能力和预见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谢拉是有贡献的。谢拉也认为社会认识论是一门综合学科,有其丰富的内涵。但是,我们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所见的只是如上所述的一种繁琐的推论而已,历时30年,理论内容没有任何发展。谢拉逝世后,热衷于这个理论的更是寥寥。因此,与其说谢拉提出了一门颇具发展前途的学科,不如说仅是一种观念;他所提出的问题比他阐述的理论更值得我们思考。

(四)理论体系。谢拉把他研究的内容置于图书馆学的整体概念之下、社会认识论的

理论基础之上,从而形成了他特有的理论体系。

谢拉认为,文献工作是从图书馆学中产生的,它是指与书面学术交流相关联的那部分书目知识,因而分类编目便成为文献工作的业务基础。“文献工作是对图书馆传统服务方式的扩展——从图书世界向情报世界的扩展——不仅是对书面记录之保存,更是交流和传递记录知识。”^[18]图书馆学由文献工作预示了一门新的学科——社会认识论,而图书馆学本身又从中汲取了新的营养。”^[19]他还认为,情报学又是从文献工作中分离出来的,“情报学丰富了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和知识基础”^[20]。

谢拉以社会认识论作为其整个思想体系的共同理论基础,反映了图书馆学和情报学生长点上的亲缘关系。但他没有对情报学深入研究下去,甚至企图把情报学纳入图书馆学的研究范畴之中,这就比较保守了。

三、谢拉的主要理论观点述评

(一)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谢拉认为,图书馆是对知识进行管理,其“高目标是要最大限度地扩大书面记录知识的社会有效利用”^[21]。从微观上看,图书馆是知识与读者的中介;从宏观上看,图书馆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书面交流机制的执行机构。认识图书和了解读者是图书馆生存的两大支柱,而书目工作联系图书和读者则成为图书馆实践活动的中心。图书只有相对于特定读者才有意义,也只有成为藏书体系的一分子,它才具有了超越单本书本身价值的某种东西^[22]。图书馆是由采访、组织和服务三个部分组成的整体系统,由管理活动来保持三者的平衡比例和图书馆具体目标的实现;图书馆在三个层次上运行:技术设备、书面记录知识和社会环境^[23]。谢拉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论述有较强的概括性

与针对性,至今仍有其指导意义。

(二)书目理论、文献工作和情报学。基于共同的理论基础,谢拉关于书目理论、文献工作和情报学的论述至少有两点是一致的:

其一,他认为从本质上说三者都是为了扩大书面记录之分析、组织和检索以提供社会有效利用而不断探索新途径新方法,因而也就是一种交流。这种交流是面向用户的,所有的研究成果都必须放到满足读者需求这一点上来考察。“分类法是书目组织整个问题的核心与基础”^[24]。新机器、新设备的出现本身并不创造奇迹;只有不断完善我们的工作,使主题分析和文献组织深化,才能充分发挥机器的作用^[25]。机器使图书馆员从事务性的重复劳动中解脱出来,从而有机会成为真正的主题分析专家^[26]。机器的进步也使图书馆员用系统的观点来分析图书馆,对现实状况寻求理论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自动化的贡献之一就是使图书馆学更加科学^[27]。

其二,他认为无论是书目理论、文献工作还是情报学,都必须有社会的眼光,必须从整个社会的协调统一来分析问题。“书目管理的真正意义便在于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书目工作体系”^[28]。“文献工作研究的是关于提高学术文化的整个社会记录资源的系统开发的书目组织”^[29]。而情报学是为了促进科学交流而产生的,应该建立权威的情报协调机构及交换中心,对科技情报实行综合开发。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谢拉就开始致力于图书情报事业的社会协调^[30]。这正是其理论观点的体现。

(三)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谢拉有近30年的教学经历,他对图书馆学教育理论也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总的一点认识就是:“未来的图书馆学教育必须适应环境的迅速变化”^[31]。

谢拉认为,技术在迅猛发展,专业课程永远处于变革之中,我们今天传授给学生的操作知识明天就可能被淘汰,或为机器所取代。

未来的图书馆员必须适应环境的迅速变化,他们是书目组织与文献服务方面的专家,而不能仅是简单的操作员与办事员。图书馆学院应该把交流作为一个社会过程来教授,提供一个图书馆学的统一理论基础,而不能只是进行学徒式的培养。学院应该教给学生一种观念,一种思想态度,一种对现实进行沉思的愿望。因而社会认识论不但为专业研究,也为专业教育指明了方向^[32]。

在专业教学中,谢拉鼓励并进行实验,认为实验是教学活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认为,教师只有通过实验才能紧跟乃至领导技术发展的潮流,并使技术从理论上丰富学院的教学内容;而学生只有通过实验才能感受到现实的变化,才能塑造一种创新精神。CDCR的建立就是谢拉这个思想的体现。谢拉还认为,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是极富研究性的;他极力反对设立专业本科教育,因为本科生是脆弱的,他们只会把图书馆学作为一门技术来掌握^[33]。

谢拉的专业教育思想是很丰富的。在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里,他提出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应传授一种理论而不能偏重技术,应是一种观念教育而不能是职业培训,虽则他的观点有些偏颇,但他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我们思考。

四、结束语

谢拉是一位成功的理论家,他一生的实践活动,他的思想体系及其研究方法都是他珍贵的遗产。他研究活动的信条就是:要深入到专业实践中去,紧跟时代的发展步伐,切实关注宏观现实问题,从现实需求中发展知识,从经验中产生理论,并以理论解释现实的存在和预示未来的发展。

一个多世纪来,图书馆学一直在经验与理论的夹缝中生存。谢拉发展了社会认识论,企图借此提高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水平。虽

然社会认识论是空洞的理论框架,但它还是给了我们一种研究的角度,一种思想的方法。学术水平不高至今仍是图书馆学面临的现实问题。在信息服务业变得越来越重要的今天,我们只有把图书馆置于社会信息系统的大框架之下来认识,才能准确把握它的社会位置;也只有把图书馆学纳入关于社会信息交流的知识体系中去,并作为它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存在,我们才能把图书馆学研究引向深入。

参考文献

- 1 ALA Yearbook, 1977: 62
- 2 17 Conrad H. Rawski. (a biography of) Shera, Jesse Hauk.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v. 38(suppl. 3). Dekker, 1985: 348~371
- 3 Deane Kent. (book review on) Foundations of the public library. Canadian Library Journal, 1974, 31(Dec): 601
- 4, 24 J. H. Shera, ed. with M. E. Egan. Bibliographic organization: papers presented before 15th Annual Conference of GLS, July 24~29, 19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preface, 92
- 5 J. H. Shera. Documentation: its scope and limitations. Library Quarterly, 1951, 21(1): 13~26
- 6 C. W. Hanson. (book review on) Information resources: a challenge to American science and industry, etc.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1959, 15(2): 106~109
- 7 Richard J. Vorwerk. (book review on) The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for librarianship.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1974, 10(Feb): 82
- 8, 22 J. H. Shera.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basic elements of library services, Littleton, Colo: Libraries Unlimited, 1976: 10, 77
- 9, 10, 31, 32, 33 J. H. Shera. The sociological foundations of librarianship. New York: Asia Publishing House, 1970: 28, 88, 142~158
- 11 B. C. Brookes. Jesse Shera and the theory of bibliography. 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1971, (5): 233~245

(下转 29 页)

书资料。这十分令人吃惊。现转录该《标准》19 页例 2(见图 6)作为例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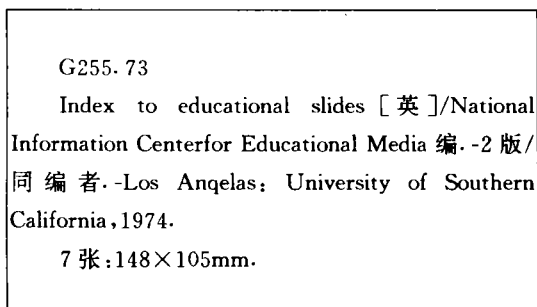


图 6 《标准》非书资料著录规则示例

(3)机读件。以前称机读件为机读资料档,是指用计算机编码处理并存储在一定载体上只能用计算机阅读的文献,如磁带、磁盘、穿孔带、窗孔卡和光盘等。由于《标准》与《规则》成文较早,对这类文献的著录规则还不够完善,AACR₂已于1988年对该章作了彻底修改。现在看来,《标准》与《规则》都应尽快加以修订。根据AACR₂,主要修订部分应是文献特殊细节项和载体形态项,主要包括计算机数据文档、计算机程序文档或软件、计算机数据和程序文档(包括目标程序文档)。载体形态项主要是记录载体数量及单位,如1卷磁带,3张光盘等。

(三)著录用汉字问题。汉字有繁体字(台湾称为正体字)与简化字之分。大陆用简化字

著录,台湾用繁体字著录,这给建立统一的书目数据库及书目检索带来困难。特别是简化汉字与繁体字(包括异体字)并非都能一一对应,如、臺、檯、怡和飴的简化字都是“台”。据粗略统计,一个简化字代表两个以上繁体汉字的有486个,这更增加了解决简繁汉字对照的难度。目前,海峡两岸还没有一个简繁汉字统一而完整的汉字库。随着海峡两岸书目文献交流和共享事业的发展,解决这一问题势在必行。从长远看,出路在于研制出简繁汉字相互转换的电脑软件。同时,我们希望海峡两岸的图书信息专家携手合作,共同制订一部能为海内外接受,既符合国际标准,又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汉文文献著录标准。

21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也是中华民族的世纪。随着华人经济圈的形成与壮大,随着海峡两岸科学、文化和经济的发展,汉文文献在世界文献总量中的比重和地位将会上升。伴随这一形势的发展,制定统一的汉文文献著录标准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夏勇:1961年浙江大学英语专业毕业,1966年武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毕业,现为浙江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已发文40余篇,出版专著3种。通讯地址:杭州市。邮编:310027。

(来稿时间:1993-07-28。编发者:丘峰。)

(上接17页)

12 (book review on) Librarie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knowledge. Indian Librarian by Lockwood, 1966; introduction

14 J. H. Shera and M. E. Egan.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bibliography. Library Quarterly, 1952, 22(April): 125~137

15, 26, 27 J. H. Shera. Introduction to special issue on documentation and automation. Wilson Library Bulletin, 1964, 38(9): 741~742

16, 20 Margaret Kaltenbach. (a biography of) Shera, Jesse H.. ALA World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Chicago: ALA, 1980: 524~526

19 Verner W. Clapp. More "Jessinia". Library Journal, 1967, 92(1): 87

21, 23 Jesse Hawk Shera. Philosophy of librarianship. ALA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Chicago: ALA, 1980: 314~317

28 Phyllis A. Richmond. (book review on) Information resources, etc. Library Resources and Technical Services, 1959, 3: 231~235

29 J. H. Sher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documentation. Library Trends, 1957, 7(2): 187~206

30 肖自力. 对图书馆事业的哲学思考——《图书馆学引论》中译本序. 图书情报研究, 1986, (2)

罗志勇: 199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 现为该系研究生。已发文多篇。通讯地址: 北京大学。邮编: 100871。

(来稿时间: 1992-11-13。编发者: 黄文田。)